

书内容主要采取阿里斯多德、盖伦的旧说。”⁽¹⁾说其中“包括了维萨里革新后的解剖学内容”，并非事实。值得指出的是，明万历46年（即1618年）邓玉函等来华时，曾带来西书七千部，现已查明内有维萨里的解剖学巨著《人的构造》，但不知何故在他们的译著中却未利用及论及。

四、李时珍是否接受过西洋医学的影响？

王清任在《医林改错》“脑髓说”中，除了“引用汪讱庵之书”外，还引用了李时珍的“脑为元神之府”这句名言⁽⁵⁾。“脑为元神之府”一语出自李时珍（1518～1593）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其意为大脑乃高级神经活动的场所，据考证⁽⁶⁾，这在中国是“首次提出精神、思维等活动是在脑不在心的看法”。众所周知，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均是认为“心者，君主之官、神明出焉”，“精神之所舍也”，从无人主张过“脑为元神之府”，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李时珍是一个勇敢的开拓者。王清任把他尊为“脑髓说”的最先倡导人，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。还需指出的是，与李时珍同时的李梃，在1575年所著的《医学入门》一书中也对“心主神明”说提出了异议。他虽承认“心者一身之主，君主之官”。但他把“心”分为“血肉之心”和“神明之心”两种，认为：“有血肉之心，形如未开莲花，居肺下肝上是也。有神明之心，神者，气血所化，生之本也。”李时珍和李梃两人殊途同归，都不承认“血肉之心”是“精神之所舍”。李梃认为主宰神明的真正器官是“神明之心”，而李时珍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大脑是高级神经活动的场所，这真叫无独有偶啊！可是，有明一代，更多的医家如张景岳等却仍坚持“聪明智慧”，莫不由心。人们自然要问：李时珍关于“脑为元神之府”的观点究竟来自哪里？为什么“众人皆醉，唯他独清”？这系他头脑中的产物，或系也来自西洋医学？

任应秋教授认为：近代中国的“脑髓说”是源出西洋医学的。他说：“总的说来，祖国医学对脑的认识较早，亦皆精确，只是记载的不多，亦不甚全面。特别

是在封建社会的长时期便固守‘心主神明’之说，而于脑的认识毫无进步，直至明代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，逐渐为医学家所重视和吸收”⁽⁴⁾。对于他的这一评论，我是完全同意的。基此认识，我认为李时珍的观点也系来自西洋医学的影响⁽⁷⁾。

有人⁽⁸⁾认为“脑髓说”“是鸦片战争前我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时期的产物。”这一看法正确地把“脑髓说”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到了一起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在封建主义的中国只能产生“心主神明”的学说，而不可能产生“脑主神明”的观点。在明末清初之际，中国虽已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，但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要落后的。故我们认为中国不可能反比西方更早地产生脑髓说，相反更有可能是西方比我们早产生这一学说。因目前虽尚无直接文字根据，但我们“从历史时间、条件看来”，说李时珍受过西医影响，“是很有可能的”（借用任应秋语）。作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，李时珍敢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枷锁，接收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，这种能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勇敢精神，实在令人敬佩。

参 考 文 献

1. 张慰丰·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. 中华医史杂志1981; 11(1):1.
2. 彭 兴·王清任与西洋医学. 甘肃医药1983; 1(1):80.
3. 范行准·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. 第1卷, 北京: 中华医史学会, 1943; 6.
4. 任应秋·中医各家学说. 第1版, 上海: 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3: 157～192.
5. 陕西省中医研究所·《医林改错》评注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76: 49.
6. 许自诚, 等. 历史地认识祖国的“心脏”, 编写《医学百科全书·中医基础理论》时的体会. 兰州医学院学报1979; 1:108.
7. 彭 兴·李时珍与西洋医学. 社会科学 1983; 6:82.
8. 何玉德·王清任“脑髓说”的哲学意义. 光明日报1978年3月24日.

· 读者来信 ·

编辑同志：

我们在贵刊今年第一期刊物中了解到贵刊准备在今后期刊中，增加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实验研究的论文，这实在反映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希望。长期以来，我们国家对基础理论研究是不够重视的，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，对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。很多基础理论、实验研究得不到交流，这怎能提高整个医学科学的水平呢？

所以看到贵刊编委会讨论意见后，我们感到贵刊是有远见的，希望这个专栏和其它专栏一样办得更好。我是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实验与教学的，我将在今后加倍努力，多撰写这方面的稿件，作为对这工作的支持。

特致

敬意

江西中医学院生化教研室 伍嘉宁

1986年4月24日